

《植物的记忆与藏书乐》,[意] 翁贝托·艾柯著,王建全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8月出版

国内读者熟悉意大利学者、作家翁贝托·艾柯是他“百科全书式”的写作方式有关,他的学术、小说和随笔都体现出这种特质。

最新在国内出版的《植物的记忆与藏书乐》依然延续了艾柯的百科全书式的风格,是他关于爱书藏书的总结,横跨历史、文学、美学与科学的多元向度。

被遗忘的“植物的记忆”

何为植物的记忆?人类在最初的文明里,老人坐在山洞里、篝火旁,讲述着那些在年轻人出生之前发生的故事,是肉身的记忆;将文字印在石头上,是矿石的记忆;在这之后,文字的载体是丝绸、羊皮纸等;纸张从中国传入西方,起初由植物的碎屑制成,后来的原料演变成木浆,成为我们记忆的载体,即植物的记忆。

《植物的记忆》是《植物的记忆与藏书乐》的开篇文章,可以说是全书的总领,艾柯在其中阐

读艾柯时,读些什么

■本报记者 温新红

明了自己的写作意图。

意大利特兰托大学教授加布里埃拉·莫雷蒂在序言中说,书籍形式正处在翻天覆地的变化中,艾柯没有忽视这些,正是通过这本书带领读者一起经历这一过程,并作出深入思考。

艾柯曾说:“书籍如同勺子、锤子、轮子、剪刀一样。一旦你创造出它们,就没有办法再进行改进了。”他相信人类和植物的记忆,二者恐怕还要长期幸福地共存在一起,艾柯的作品清晰、丰富而又充满幻想地向读者展现了双方古怪和意想不到的关联。

另一方面,他没有试图否认电子书正在和将要扮演的重要角色,书中有一篇《一本电子书的内心独白》,艾柯从一本电子书的自身感受出发,深邃又不乏幽默地谈到了这一媒介转换所引发的阅读危机。

作为享誉世界的学者、中世纪学家、符号学家、作家与藏书家,艾柯个人藏书超过三万册,其中珍本超过1200册。

“艾柯一贯乐于讨论与书有关的话题,这本书延续了他的这一兴趣。”南京大学德语系教师、资深的艾柯爱好者和藏书人钦文说。

艾柯会针对不同的读者、不同场合谈论书,每次都会有新鲜的内容。钦文认为,《植物的记忆》是这本书的核心,可以算作他之前谈论书的各种观点的重新解读,也就是说,这篇文章集中地再次展现了他之前关于书的文章的很多想法。

读艾柯需要一定的知识储备

《植物的记忆与藏书乐》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关于爱书”;第二部分“历史”,艾柯从介绍两部分写在羊皮纸上的书开始;第三部分“文学(科学)狂人”,引导读者去发现和了解一些作者;第四部分“异位与建造”,表达了他的“爱书幻想”。像艾柯的所有书一样,这本书内容同样丰富。

“首先我认为这本书是带有个人人类学视角的一本随笔。”作家黄集伟认为可以从三条路走来

读这本书,其次从做出版的路径来读这本书,第三则是从书迷的角度,因为这是一本书迷们最会感同身受的书。

“给我的感受是,这本书是启发人的智力的。”出版人、作家杨葵表示,现在微信朋友圈有很多“科普文章”,无非是教人糖是甜的、盐是咸的这类知识,但艾柯不这样的,尽管能在他的书中学到很多知识,但读这本书时读者不会注意到自己掌握了多少知识,因为艾柯实际上是在启发读者。

钦文向记者介绍,艾柯的写作分为学术著作、杂文、小说和图册四类。艾柯的专业文章融入历史的观察,很扎实。而其中体现的那种文采和趣味性又是书斋里枯燥的学者所没有的。

“他的杂文我特别喜欢。”钦文介绍,艾柯本身有丰富的经历和广泛的阅读,通过日常事物得出一种与众不同的结论,从细微处发现一些共性的问题。

艾柯在小说中融合一些考证,或者把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事实和知识在故事中展现。钦文介绍,如果对历史年代、虚构当原型的历史人物没有了解也无所谓,就当做一个故事来读;如果是一个历史学家或者艺术史家,会发现艾柯对中世纪历史的认识。

艾柯对艺术的洞察也是令人惊叹的。除了在学术圈内传播的艺术史论外,为普通读者所熟知的是他编纂的几本图册,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美的历史》。这些图册与一般艺术史著作的不同之处在于,在画龙点睛式点评各类作品的同时,艾柯“忍不住”旁征博引历代思想家、史学家、作家、科学家乃至某些不知名作者的文字。换了别人,这种写法很容易让人产生堆砌之感,但到了“叙事大师”艾柯笔下,图与文自然地水乳交融。

“读他的书还是需要一定的起点的,他的书对读者的智力和知识储备有一定的要求。”钦文认为,因此,艾柯在有一定知识文化的阶层中更受欢迎。

书里书外

距今大约170年前,随着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的失败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长期闭关锁国的中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国近代史就此发端。随后,经历了产业革命和交通革命洗礼的英、法、俄、美等强国,出于对支撑其发展所需原料、市场等的考虑,纷纷将视线投向了远东。1854年,日本也被迫打开国门,与美国签订贸易协议。不久,英、俄、荷等国援例而至,也跟日本政府签订了类似条约。

当时的普鲁士政府坐不住了。他们于1860年派出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外交使团前往东亚,意欲与中国、日本、泰国等建立外交关系,缔结商约。这个配备了三艘军舰的外交使团实际上混杂着帝国赋予的外交和经济表象之外的各种使命。其中一项,即是效仿英国成例,在中国获得一块类似香港的商港和海军锚地。使团中,一位年仅27岁的地理学者费迪南·冯·李希霍芬(1833~1905),接受了秘密勘测选址的任务。

1861年3月,普鲁士外交使团到达上海。当时正值英法联军入侵之后和太平天国运动兴盛之时,使团成员活动受到限制。同年9月,清政府被迫与普鲁士签署《通商条约》,标志着中国与德国(当时以普鲁士为代表)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归国途中,李希霍芬等乘坐一艘军舰先行离

“丝绸之路”命名者的中国缘

■尹传红

去,对中国台湾、菲律宾、苏门答腊和爪哇进行考察。这一趟东方异国之旅,让眼界大开的李希霍芬萌生了对中国的强烈兴趣。

1862年,做好了充分准备的李希霍芬试图由南亚迂回进入中国,可原先承诺资助他的汉堡银行家突然变卦毁约,他不得不临时改变计划,乘船横穿太平洋到了北美。1862年至1868年间,李希霍芬在加利福尼亚从事地理学考察,研究,他对当地采矿的研究成果,竟带来了两个意外的惊喜:一是间接导致了美国西部的“淘金热”,并使他在同行和投资者中赢得了巨大的声誉;二是加利福尼亚的银行家们慧眼识珠,表示愿意资助这个“能猜透西部秘密的普鲁士人”,开展一项旨在发现商业机会的对华考察活动。

这真是瞌睡遇上枕头,李希霍芬大喜过望。他很早就意识到中国“具有巨大的科学考察价值”,还认定“对它的考察有望在学术上和现实中获取广泛的成就,考察中国任务巨大,但我决定为之奋斗人生中最重要几年”。

按照约定,由加利福尼亚银行资助李希霍芬的中国之行。从上海登岸后,上海欧美商会将给他提供旅华4年的经费,条件是:他必须对从考察地区获取的地理和地质资料,以及物产、人

口、交通、风土人情等社会经济概况,用英文及时向商会作专题报告。

1868年9月,李希霍芬经日本来到中国,开始了他独立研究的中国之旅。之前在他去北京总理衙门领取护照时,他遵照朋友的建议,有意将其姓氏译由最初的“栗”改为“李”,以跟清廷重臣李鸿章同姓,希望能借此增加亲和力,抬高自己的身份。

1868年至1872年间,李希霍芬对大清帝国18个行省中的13个进行了地理、地质考察,足迹遍布当时局势动荡的华夏大地。考察途中,他的脖子上总是用绳子挂着一支长长的铅笔,以方便他随手以绘画的形式将自己一路上的见识记录下来。他还一一画下路过的山脉和平原,并从地质学的角度潜心研究。

当然,为了不辱“使命”,李希霍芬记得更多更细的,还是中国的煤矿分布和各地的物产、商业情况,并对煤矿的开发价值进行评价。考察期间,李希霍芬就像一名通讯记者一样,不断地将其所见所闻以信件形式寄给上海欧美商会。这些信件后来汇集成册,以《李希霍芬男爵书信集》为名出版。

有意思的是,李希霍芬虽然是拿着上海欧美商会的银子出行,但把德意志帝国的统一和

百科全书式的畅销书作者

艾柯知名度最高的小说是《玫瑰之名》(又译为《玫瑰的名字》),也是艾柯的第一部小说,曾被好莱坞拍成电影。这部侦探类小说全球销量达到几千万册。

艾柯的各类书在欧洲的销量都不错,属于畅销书作家。有意思的是,钦文告诉记者,艾柯的阅读也有一个类似粉丝文化的“圈子”,大家在一起阅读并讨论,就像华人对待金庸、古龙的作品一样。

在艾柯传奇性作品出版后,喜欢他的读者会期待他的下本书,而下本书出版后也没有让读者失望,于是又期待再下本,“他的成功是持续的成功,与没有让读者失望有关系。”钦文说自己也经历了这样一个心理过程。

然而,艾柯在中国的阅读情况有些不同。杨葵是国内较早发现艾柯的,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他打算出版《玫瑰之名》,在编辑的过程中,他发现自己已是“自讨苦吃”,因为有关外国人名辞典和地名辞典工具书不够用,很多内容查不到。

“《玫瑰之名》前前后后编了七八个月,一点一点地抠。但这本书还是我个人编辑史上非常不满意的出版物,当时的知识储备对于编辑艾柯作品来说是远远不够的。”杨葵表示。

事实上,对艾柯来说,百科全书式不仅体现在内容上,更是他的一种叙事方式。钦文表示,“无论他写什么,总能感觉到他能将各种知识杂和以后以一种非常精巧的方式得到展现。”

这也是国内读者阅读艾柯的困难之处。钦文分析其中的原因有两点,一是背景因素,以小说为例,艾柯写到的中世纪题材欧洲读者更为熟悉,因为这些题材会在欧洲其他历史小说中多次出现,只不过艾柯把它编织在另外一个故事里。另一个是中文翻译问题,无论是译者的知识储备还是文字转换过程中信息损耗,相对来说会比欧洲各国文字间转换损耗多一点。

强大视为最高理想的他,在向“东家”汇报工作时还是不露声色地留了一手——隐瞒了一些他认为事关国家利益的重要信息或观点,比如山东胶州湾的重要战略地位(后来德军在报请德皇批准的针对中国的军事计划中,曾多次引用了李希霍芬的考察结论)。

1873年,李希霍芬回国,先后出任柏林国际地理学会会长、柏林大学校长、波恩大学地质学教授、莱比锡大学地理学教授等。他用后半生大部分精力撰写了一部5卷鸿篇巨著:《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附地图集2卷)。正是在1877年出版的《中国》第一卷中,李希霍芬首次提出了“丝绸之路”的概念,并在地图上进行了标注。这一术语后来被广泛采纳。他还最早提出了中国黄土的“风成论”,以及“五台系”和“震旦系”等地层术语。

李希霍芬是第一位对中国地质从基础上进行研究的国外地质学家。他在中国的考察,研究成果彻底改变了西方对中国的认知,并且对近代中国地质学、地理学的产生和发展具有重大影响。人们既把他看作是近代中国地质学研究的先行者之一,也把他视为近代中国和西方国家科学交流的重要先驱,尽管在他身上,一直带着许多光荣与非议。

编辑荐书



《大人的科学:风力双脚机器人》,日本学研教育出版编著,杨林译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12月出版

与《大人的科学》中文版此前推出的静态作品相比,这款是唯一会动“走路”的模型,是同系列中趣味度最高的一款,也是唯一的机械类模型,深受DIY爱好者的推崇。

荷兰艺术家泰奥·扬森利用海滩上的废品创造出举世闻名的风力仿生装置:海滩怪兽。本书附件中的风力双脚机器人,即以“海滩怪兽”为原型开发的新一代升级版。不需要马达,只需一阵风,机器人就能像小鸭一样迎着风持续“抬脚迈步”行走。

这种依靠联动曲轴和重心转移来完成的惊人行走,背后有着深奥的科学原理。主题书中详尽介绍了人类双脚步行的机制、双脚机器人的发展历史,还有关于走路姿势的最新研究报告和超级炫酷的附件模型改造攻略。

阅读分享

“这是一个没有声息的春天。这儿的清晨曾经荡漾着乌鸦、鸽子、椋鸟、鹈鹕的合唱以及其他鸟鸣的音浪;而现在一切声音都没有了,只有一片寂静覆盖着田野、树林和沼泽。”这是雷切尔·卡逊的名著《寂静的春天》开头部分的一段话。

这本书于1962年出版,至今已50多年。推荐这本当代人已非常熟悉的经典著作,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田松表示其理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状况比那时更为严重,更加危险。”因此,他认为这本书一点也没有过时,每个人都应该认真地读一遍或者再读一遍。

看清我们的现实

田松近几年关注文明走向的问题,他对当下社会的总体判断就是,我们处于一个文明的转折点,如果不能及时转向的话,找到一种和自然和谐相处的文明形态,人类文明就会崩溃。

“这个崩溃不是阶段性的,是终结性的。”田松表示,以往的文明崩溃是局部的,一段时间后在原来的大地上会产生新的文明。但工业文明让生物圈整体发生紊乱,大自然受到根本性的破坏,下一轮文明没有生长的土壤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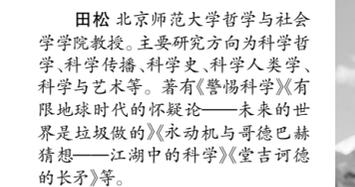
卡逊显然已经观察到并预见这种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不是量的层面上,而是质的、根本性变化,是不可逆的。《寂静的春天》谈到DDT及化工产品的危害,为什么会发生危害,危害会是什么样的,书中不但有很精准的细节描述,还有对全局的整体描述和判断。

“卡逊是一个‘先知’,我建议大家重读这本书,明白现在的环境已经被破坏成什么样了,知道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也是让每个人都意识到我们处于多么危险的处境中。”田松强调。

另一个让田松认为读《寂静的春天》重要的

田松谈《寂静的春天》《沙乡年鉴》: 每个人都应该读一遍

■本报记者 温新红



田松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科学哲学、科学传播、科学史、科学人类学、科学与艺术等。著有《警惕科学》《有限地球时代的怀疑论——未来的世界是垃圾做的》《永动机与哥德巴赫猜想——江湖中的科学》《堂吉珂德》等。

原因是当下发展的声音仍然一天高过一天。“一切实践性的理论都和两个前提有关。”田松说,一是对当下社会的判断,另一个是对于未来的预期。这两点决定了理论的走向。“如果你预期的未来是根本不能实现的,或者你所判断的当下是不符合实际的,那你的理论注定是空的、没有意义的、不着调的。”

现实是怎样的?在田松看来,如果还有一个劲地强调发展,强调GDP,就相当于在悬崖边上跳舞,或者是在一层薄冰上喜气洋洋地开Party。不仅如此,我们的主流文化领域还是一种相对乐观的状态,认为这个世界、自然界是可控的,就是说一切问题会随着科技的进一步发展找到方法解决的。



“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处,身处什么状态,这是很悲哀的事情。”田松说道。

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好生活

美国前总统阿尔·戈尔在《寂静的春天》再版序言中说,这本书“对我个人的影响是相当大的……我们在饭桌旁进行讨论……我们的讨论是愉快的,留下了生动的记忆。”

这种情形也是田松所盼望的。“它是基于我们对于工业文明的、整体的重新认知的起点。”田松表示,每个中国人、华人乃至全世界每个人都应该读的,它应该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读本。

作家叶开一直是语文教学的探索者,在他眼里,现行的语文教材,局限了学生对“语文”的认识和理解,而他理解的“语文”,应该把文史哲所有的知识都包括进去。由他编写的“这才是中国最好的语文书”系列丛书便是对于“理想中的语文教材”的一种尝试。

近日,“这才是中国最好的语文书”系列丛书第四册——诗歌分册出版上市。书中分“时间与季节”“亲爱的动物们”“花树与果实”“火车与旅行”四个部分,精选了穆旦、林徽因、徐志摩、闻一多、戴望舒、海子、顾城、北岛等众多现代名家的诗歌作品。

为什么选择现当代诗歌?叶开说:“中国诗歌历史悠久,从《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元曲,诗歌一直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精髓。五四新文化运动后,诗歌分成了旧体诗和新诗。不过在普通公众眼里,一想到诗歌,仍会想到押韵,想到整齐的行列。”

押韵就是诗歌,这种认识是错误的。“文章体裁的变化,随时代和现实而变化。在格律、押韵无法满足表达需求的前提下,自由体的散文和小说都出现了。而突破整齐行列的句词,也有规律押韵的前提下,调整句式为‘长短句’。王国维先生说:‘一时代有一代之文学’。所以今天的读者不必拘泥于成见,认为诗歌一定要押韵。古人都能突破,以新态度、新胸怀来面对变化,今人更应该胸怀宽阔,广泛容纳。”叶开说。

五四新文化运动至今,新诗虽历经种种磨难,仍取得很高成就。新诗题材丰富多变,语言运用自由,意象磅礴充沛,但是这些成就却无法在现行语文教材中得到体现。

“现行语文的主要教学方式之一,是要求教师‘教透’课文,要求学生‘读透’课文,对每一篇课文的字、词、句、段、节、章,无所不至地加以过度阐释,把作家、诗人可能根本没有想到、根本不曾表达的意思,额外地硬加在作品上。”叶开感慨道,“这种教法破坏了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特有的完整性。其中,许多优秀的现当代诗歌因为无法被教师和学生‘读透’,无法进入语文教材,正在学习的中小學生,也与当代诗歌隔绝。”

叶开认为,阅读现当代诗歌,不一定需要想着“读透”,要先读起来,在具体的阅读中获得直接的语言和故事的感觉。经过一定量的阅读积累,就会对现代诗歌有一种直接的、细腻的感受。

为此,叶开在编写诗歌分册时,并没有按诗歌发展的时间段和流派来选择,而是以某些主题、素材来归类。“这样把不同诗人的不同作品混排在相近的主题下,是为了方便中小学语文教师和学生阅读。”而且在每首诗歌甚至每节诗歌后,他都进行了精练且富有哲思的点评,不仅在带着大家“读诗”,也在引导读者去了解那些精妙诗句背后或宏大或个性的历史与人生。

叶开说:“最近网友们批评叶青,先不说叶青诗歌本身,就叶青挑战语言的等级秩序及激发的现象,也能看到语言运用的威力。如果你认真去看,会发现叶青对诗歌的分行非常‘狡诈’,所以从写诗的角度,我认为他是成功的。你可以不喜欢《对白云的赞美》,但别吹牛说你一天能写出100首这样的诗。实际上,到现在为止,说这些话的人仍然一首都没有写出来。”

《这才是中国最好的语文教材(诗歌分册)》,叶开选编,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年11月出版

除了推荐《寂静的春天》,田松还同时推荐了美国作家奥尔多·利奥波德自然随笔和哲学论文集《沙乡年鉴》。他人为这两本著作是相辅相成的。

《沙乡年鉴》原版出版于1949年,与19世纪最著名的美国自然主义著作的经典作品——亨利·戴维·梭罗的《瓦尔登湖》占据着同等重要的位置。《沙乡年鉴》前半部是很好的文学,后半部是他的环境思想。

田松几年前在北京师范大学开了一门环境哲学课,他会在课堂上让学生精读这两本书中的片段。《沙乡年鉴》是早期环境思想著作,对我来说意义又略有不同。书中很多内容可作为思想资源,它本身又提出了明确的哲学思想并有系统的论述,比如大地伦理。这个文本非常重要。

《沙乡年鉴》序言中的一段话尤其被人称道:“野生的东西在开始抛弃之前,一直和风吹雨打一样,被认为是极其平常而自然的。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一种平静的较高的‘生活水准’,是否值得以牺牲自然的、野外的和无拘无束的东西为代价。对于我们这些少数人来说,能有机会看到大雁七看电视更为重要,能有机会看到一只白头翁发芽就如同自由地谈话一样,是一种不可剥夺的权利。”

“他谈到生活的方向,什么样的生活是好生活的问题。”田松解释道,工业文明取代传统文明后,导致了理想生活的标准发生了变化,传统社会的理想生活首先是个人精神境界的提升,人与人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团结,这是社会的目标。而工业文明中,金钱成了最重要的、核心的目标。当下,在我们现代社会所建构的生活里面,不断更新的电子产品貌似是我们生活的主角,“理想社会的方向变了,人们已不知道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好生活”。

和《寂静的春天》一样,田松认为,《沙乡年鉴》中蕴含的思想放在今天也不过时,而且是非常新锐的、有活力的、重要的思想。

叶开教你欣赏现代诗歌

■本报记者 王俊宇